

## 【理论探讨】

# 再论汉代的瘴气\*

张亭立 陈丽云<sup>△</sup>

(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 上海 201203)

**摘要:** 结合“障气”的语言学、地理学意义, 探讨秦汉时期“瘴气”致疾因素与概念生成的相互关系。“障气”源于汉人对丘陵山地地理、气候等自然状态的一种描述。继而在南岭多岭多水的地理特征、暑热潮湿的恶劣气候与毒物丛生的物候条件下, 一种以“暑”“湿”“毒”为致病因素的“瘴气”概念出现并逐渐代替“障气”, 成为南岭地区特有的地理及气候环境代称。随着两汉大一统历史进程的推进, 中原王朝的疆域不断扩大, 越来越多的域外蛮荒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 “一定的地理环境”指称范围不断拓展, “瘴地”与“瘴气”逐渐突破南岭一地之限制, 而成为“非中土地域”及其恶劣地理状况及其气候环境特点的代名词, 北方高原地区“冷瘴”概念的出现即是典型例证。

**关键词:** 障; 障气; 瘴气; 暑; 湿; 毒; 冷瘴

**中图分类号:** R222.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3250(2021)07-1065-04

**DOI:**10.19945/j.cnki.issn.1006-3250.2021.07.006

有关“瘴”的名实问题学界已有不少讨论。对于瘴病究竟指什么病, 有学者认为应“大致包括热带病、地方病、人体寄生虫病源污染、大气污染所致疾病等一组复杂疾病的统称。具体说, 诸如疟疾、痢疾、脚气、黄疸、消渴、克汀病、沙虱热、癰疽以及瘴毒发背、青腿牙病、高山病、砒中毒, 或因空气污染所致一氧化碳中毒、硫中毒、汞中毒, 以及水源污染所致的乌脚病、癌肿及花粉过敏甚至梅毒等都可称为瘴气与瘴病”<sup>[1]</sup>, 有学者则认为“瘴病基本上是恶性疟疾”<sup>[2]</sup>。后一说法的提出以 20 世纪 30 年代对瘴气、瘴病的现代流行病学调查为基础, 故而得到医学界与医史学界相当多的共识。但就这两种观点来看, 学界仍有争论, 特别就疾病的范围来看, “古代的一些疾病名称, 在近代以至现代都会有所沿袭, 从这一点上说, 古今有关瘴气的看法应该还是比较一致的, 而瘴气所包含的疾病, 也应当是由多而少、鲜有因时代变易更生附会而增多”<sup>[3]</sup>。

以上二说其实反映的是“瘴病”的广义与狭义概念, 本质上并不冲突。但由于学科内涵与界定方法的古今差异, 现代疾病与古代疾病的名称之间不宜做直接对应。“多种疾病与症状都可称为瘴气与瘴病”的表述不够准确, 因为“瘴气”与“瘴病”本是 2 个不同的概念, 前者是古人对一定的地理环境中与暑湿等气候条件相关的特定自然现象的描述, 后者指称的是人处于这种特定地理环境中所发生的疾

病。厘清“鄣”“障气”“瘴气”的概念内涵与三者间的关系, 将有益于正确清晰地理解古人语境中的“瘴气”。

### 1 从“障”看“障气”的地理、气候学意义

“障气”一词最早出现于西汉刘安等所编纂的《淮南子》。这一部书原本就是刘安集其宾客为实现汉帝国大一统所制定的治国方略, 其中的《地形训》以大一统的眼光将整个天下都看作汉廷的疆域, 描述了 15 种自然地理状况: “山气多男, 泽气多女, 障气多暗, 风气多聋, 林气多癯, 木气多伛, 岸下气多肿, 石气多力, 险阻气多瘿, 暑气多天, 寒气多寿, 谷气多痹, 邱气多狂, 衍气多仁, 陵气多贪。”<sup>[4]</sup> 这一部分的标题是“地形训”, 在 15 种自然地理状况之前有一句“土地各以其类生人”, 可见讨论的是不同地理气候环境对人身疾病的影响。这里的“障”与“山”“泽”“风”“林”“木”“岸下”“石”“险阻”“暑”“寒”等并举, 指称的是一种地理气候的自然状态。

障, 从阜, 章声。《说文解字》: “障, 隔也。”阜, 义为大陆, 所谓有石者为山, 无石者为阜, “阜”指的就是土山。《尔雅·释山》中说, “上正谓之章”, 郭璞<sup>[5]</sup>注“山上平”, “章”可用于表示平正的土山。“障”字从阜, 从章, 指的就是土山。联系《淮南子·地形训》中的记载来看, “障气”之最初义指的就是“土山之气”。因古代的地理区划常常由山川区隔自然而成, 如秦岭分南北, 泰山分齐鲁, 故而将“障”的意义解释为“隔”, 这种“隔”不仅是地形上的分隔, 更由于古代交通条件的不便形成了人群、政治、文化上的藩篱。

自秦开始, 南岭就是中原王朝对楚国之南(湘桂赣粤相连区) 群山区域的总称, 其中的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由西向东横亘湖南、两广、江西之间, 原本是秦汉早期的 5 个军事要塞, 后

\*基金项目: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4BYY002)-秦汉医籍文化阐释; 华东师范大学“幸福之花”基金先导研究项目(2019ECNU-XFZH010)

作者简介: 张亭立(1980-), 女, 安徽合肥人, 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从事中国传统医学科技文化史研究。

△通讯作者: 陈丽云(1965-), 女, 上海人,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从事科学技术史(医学)研究, Tel: 021-51322137, E-mail: zhangtingli2008@126.com。

来由要塞扩大为地理概念,成为南岭的主要构成部分。这部分地区山脉绵延,水系繁多,雨量丰沛,无论其地形地貌还是气候环境都迥异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一直被视为蛮荒之地,称为“南越”,生活在南岭以南的少数民族被看做蛮夷。

秦始皇时,赵陀在南海做龙川令。秦二世时,南海尉任嚣病重将死对赵陀说“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于是赵陀“绝道聚兵”“自立于南越武王”<sup>[6]</sup>,他所依仗的就是山川阻隔所带来的地理优势。汉武帝建元六年欲出兵征讨南越,淮南王刘安上书加以劝阻,其中描述南越的地形“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寸数,而间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弗能尽著”<sup>[7]</sup>,强调的也是一个“隔”字。元帝时曾征骆越,骆越指的就是北起贵州与广西交界的红水河流域,南至交趾境内红河流域之间,即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部。酈道元《水经注》卷三七叶榆河条引《交州外域记》说“交趾未立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sup>[8]</sup>“雒”与“骆”通,“雒田”即是“骆田”。壮语对山麓、岭脚地带一律统称为“六”,“六”“骆”音近,“骆(六)田”指的是山麓岭脚间的田地。在广西左、右江及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有不少田地是在山岭间辟成的,以骆、洛、雒、罗等字作地名的十分常见,其命名的主要依据就在于岭南多丘陵山地的地貌特点。

当秦汉的统治者为了帝国大一统事业挥鞭南指,意图向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勉力推进之时,南方众多的山地丘陵成为了横亘于汉军铁骑面前的第一道障碍。以丰沛降雨、炎热气候、蛇虫蚊蚁毒物丛生为特征的“瘴气”,则成为这一地面貌最具危险性的存在。

## 2 瘴气致病的因素

### 2.1 从“障气”到“瘴气”

“瘴”首见于《后汉书》。公孙瓒的长官坐法徙于日南,瓒“具豚酒于北芒上,祭辞先人,爵觞祝曰: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诣日南。日南多瘴气,恐或不还,便当长辞坟茔。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观者莫不叹息”<sup>[9]</sup>。《马援列传》记载建武十八年,马援出岭南,征交趾,平定徵侧、徵贰姐妹的叛乱。建武二十年秋,“振旅还京师,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sup>[10]</sup>。稍晚于《后汉书》成书的《玉篇》中已收录“瘴”字,释为“瘴,之亮切,厉(疔)也”<sup>[11]</sup>。与表示地理自然状态不同,“瘴”已经成为表示疾病的专有名词。

最早把“鄣”的地理特点与疾病联系起来的人是郑玄,他在解释《周礼·地官》中“地愿”时说:“地愿,若障蛊然也”。又云“地愿,所生恶物害人者,若虺蜮之属者”<sup>[11]</sup>。从逻辑关系来看,这里的“鄣、蛊”不可能是并列对举关系,而应看作“鄣蛊”,

指的是鄣地之毒虫,如“虺蜮之属”。清·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地官·土训》就郑玄注“若障蛊然也”所下的按语是:“《玉篇·疒部》云:‘瘴,瘴病也。’古止作‘障’。《三国志》公孙瓒、全琮传,日南、苍梧、南海并有障气是也。”看来孙诒让所看到的《三国志》中,“瘴气”仍然写作“障气”。这一方面说明“瘴气”继承“障气”而来,地理环境的“障气”转变为疾病名称“瘴气”;另一方面也说明在一段时间里,对“鄣气”和“瘴气”的应用是混同无别的。

### 2.2 “瘴气”与“暑”“湿”“毒”

按照传统医学的疾病分类,瘴气属于温湿疾病。范行准<sup>[12]</sup>在《中国病史新义》中即指出,秦汉时期史籍记载的“湿疫”“温湿疾”并属“障气”。

元光五年蜀地到夜郎的路已大略修通后,汉武帝征发巴、蜀、广汉卒数万人进一步修治通往西南夷的道路,“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巨万计”。当是时,“土罢饥馑,离暑湿,死者甚众”<sup>[7]</sup>。失败的原因仍是“暑湿”。刘安为此上谏书,明确指出南越“会天暑多雨,楼船卒水居击棹,未战而疾死者过半”“夏月暑时,呕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曾未施兵接刃,死伤者必众矣”,从而得出“南方暑湿,近夏瘴热,暴露水居,虺蛇蠹生,疾病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虽举越国而虏之,不足以偿所亡”的结论。从刘安对于南方描述可知,“所夏瘴热(暑)”“暴露水居(湿)”“虺蛇丛生(毒)”既是地理、气候与物候的3个重要特征,也是瘴气致病的3个主要来源。

汉高帝时,吕后遣将军隆虑侯灶征讨南越,“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据《史记索隐》,隆虑侯灶征无法翻越的“岭”指的是桂阳郡内的“阳山”,属于五岭之一的骑田岭山脉。而在阳山脚下,即是沅水流域,之所以无功而返是由于士卒爆发了疫病,而疫病正源于气候的暑湿。到了汉武帝元鼎五年因吕嘉之乱讨伐南越时,伏波将军路博德便出桂阳、下沅水、连秦水,与其他三路水军会师番禺,并于第二年平南越。这一次成功的征讨无疑正是吸取了前次失败的经验,“楼船十万师”放弃了翻越五岭而改行水路。但是地形上的多山可以绕路避开,气候上的暑湿却无法改变。

根据《后汉纪》的记载,马援“北征出塞,再南渡江,触冒害气,僵尸军中”<sup>[13]</sup>。建武二十四年,“武陵寇寇临沅……马援率四将军……将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万余人征五溪……三月,进营壶头。贼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会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为室,以避炎气”<sup>[9]</sup>,所谓的“害气”“炎气”指的都是瘴气无疑。

首先,“会暑甚。士卒多疫死”指出了瘴气具有“感时而发”的特点。《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记载建武十九年,越巂郡与益州郡的夷人反叛,光

武帝遣武威将军刘尚等“发广汉、犍为、蜀郡人及朱提夷,合万三千人击之。尚军遂度泸水,入益州界。特有瘴气,三月四月之必死。五月以后,行者得无害”<sup>[9]</sup>。《陈书》记载交州土豪李贲造反,广州南江督护卢安兴之子卢子雄与高州刺史孙罔共同征讨。“时春草已生,瘴疠方起,子雄请待秋讨之,广州刺史新渝侯萧映不听,萧谿又促之,子雄等不得已,遂行。至合浦,死者十六七”<sup>[14]</sup>,可见瘴气的发作有着明显的季节性特点。《隋书》中说:“(真腊)国北多山阜,南有水泽,地气尤热,无霜雪,饶瘴疠毒虫……每五六月中,毒气流行,即以白猪、白牛、白羊于城西门外祠之。不然者,五谷不登,六畜多死,人众疾疫。”<sup>[15]</sup>

其次,仅有炎热的天气尚不足以造成瘴气,“暑”还需要与“湿”相遭,才能形成杀人的疠气。越雋之所以多瘴气,《太平御览》在《剑南道·雋州》中说“越雋有泸水,四时多瘴气,三四月间发,人冲之立死,非时,中人多闷绝。唯五月上伏即无害。”<sup>[16]</sup>暴发瘴气的原因不仅在于特定的季节“三四月间”,还在于地有“泸水”,具备了“暑”与“湿”的双重条件。因此,马援“穿岸为室,以避炎气”,正是表现出瘴气遇湿而重、离水而轻的特点。而无独有偶,《南齐书·州郡上》记载漳郡合浦北界的越州,“土有瘴气杀人”,汉代交州刺史每到暑月瘴气发作之时便“避处高”<sup>[17]</sup>。

造成瘴气致病的另一个原因是物候之“毒”。出征交趾的经历是马援一生成就的高峰,对于这一段经历他曾颇有一番感慨“当吾在浪泊、西里间,虏未灭之时,下潦上雾,毒气重蒸,仰视飞鸢跼蹐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时语,何可得也!”<sup>[9]</sup>“下潦上雾,毒气重蒸”无疑指的就是前文所说的“瘴疫”,在“暑湿”之上,增加了“毒”的概念。

《汉书·王莽传》提到对南方用兵时说“焚道以南,山险高深,茂多驱众远居,费以亿计,吏士罹毒气死者什七。”<sup>[7]</sup>《汉书·贾捐之传》中说骆越“雾露气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见虏,战士自死。”<sup>[7]</sup>《魏书》说巴、蜀、蛮、獠、溪、俚、楚、越这类蛮夷之地,“地既暑湿,多有肿泄之病,障气毒雾,射工、沙虱、蛇虺之害,无所不有”<sup>[18]</sup>。射工、沙虱已由学者论证为多发于潮湿水边灌丛草地的恙虫病(丛林斑疹伤寒)<sup>[19]</sup>。至于虫蛇屡出,水多毒物所造成的所谓“毒气”,就大致相当于贾捐所说的“毒草虫蛇水土”之毒。

不仅如此,在古人看来山上的林木也是毒气的来源之一。《后汉书》中说到湖南零陵郡的舂陵时,除了“地势下湿”之外,还特地指出了“山林毒气”<sup>[9]</sup>。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说“瘴者,山岚水毒与草莽沴气郁勃蒸薰之所为也”<sup>[20]</sup>,更是将瘴气直接与山水、林木挂上了钩,虽然是宋人的言论,

但这种看法很可能是来自对秦汉以降瘴气观念的继承。

### 2.3 “瘴气”致病的原因

自汉代开始,古人对于瘴气由“暑”“湿”“毒”三气致病已经形成了共识。从实际的生活经验来看,岭南多森林。在炎热的气候中,死亡的动物植物以及植物落叶易于腐烂,蛇虫死尸与腐败的垃圾污物滋生出各种细菌和有害气体(如氧化硫、氨气、一氧化二氮、硫化氢、氯气跟部分稀有气体和氰化物,也可能含有少量的二氧化碳、甲烷以及一氧化碳等),蕴含在空气与水流中;再加上多雨潮湿,热气与湿气相遭则进一步加剧了有害气体的升腾。湿热蒸腾,聚而不散,以至于产生如氤氲般的雾气,在山川林木间盘郁结聚,无法疏泄,给人以直观的感受,其实质是空气污染以及水源污染。

对于这一种气候生物学现象,中医学从寒暑阴阳错位失时的角度进行了解释“阳生于子盛于巳,阴生于午盛于亥,阳不极则阴不萌,阴不极则阳不芽,而广南位当巳午,则阴阳之气,蕴积于此可知矣。天不满西北,地不满东南,西北方阴也,土地高浓,东南方阳也,土地卑下,而广南方属东南,则土地之卑下可知矣,以其土地卑下,而阴阳二气之所蕴积,是以四围之山,崇高回环,百川之流,悉皆归赴,及秋草木不凋瘵。当冬蛰虫不伏藏,寒热之毒,蕴积不散,雾露之气,易以伤人,此正岐伯所谓南方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者也,故瘴气独盛于广南。”<sup>[21]</sup>简言之,岭南阳气偏盛,多雨多湿,为多种毒物孕育生长提供了温床,滋生出大量浊毒有害之气,假如人体正气不固,又或者北人南来,缺乏对环境的适应与抵抗能力,这些浊气毒气便会侵害人体。明·张介宾《景岳全书》卷十四引大梁李待诏《瘴症论》中言:“余染瘴疾,全家特甚。余悉用温中固下,升降阴阳正气之药,十治十愈。”<sup>[22]</sup>其治疗的思路正以固阳正气为本。

瘴气对人体的侵害表现是多方面的,所产生的疾病症状也各不相同。因此,《岭外代答》里说“南方凡病皆谓之瘴。”空气水源污染所产生的多种微生物会导致传染病的发生,由于多水多湿又炎热的环境特别易于滋生蚊虫,就使得疟疾的发病率显得尤为突出,在无法认知疟原虫的存在时,便把这种适合蚊虫滋繁的自然环境看作疟疾发生的原因。有趣的是古代欧洲人持有相似的观点。疟疾的英文名 malaria,意思就是有害的空气。但不论是从复杂疾病的角度还是从其中代表性的疟疾来定义瘴气之疾,究其根源仍然是来自地理环境所形成的暖湿气候<sup>[19]</sup>。

### 3 “瘴气”与“冷瘴”概念的产生

《汉书·西域传》谈到汉武帝时罽宾国交通时,“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令人身

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sup>[7]</sup>”根据学者的考证,这里所记载的“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就是现代所说的高原反应<sup>[23]</sup>。“大、小头痛山”在今天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西南,属于葱岭山脉,位于中原王朝的西北。《南齐书》中说河南匈奴地“多畜,逐水草,无城郭……地常风寒,人行平沙中,沙砾飞起,行迹皆灭。肥地则有雀鼠同穴,生黄紫花;瘦地辄有瘴气,使人断气,牛马得之,疲汗不能行”<sup>[17]</sup>。“河南匈奴地”指的是甘肃、青海黄河以南,从地理位置与疾病症状表现来看,这里以“使人断气,牛马得之,疲汗不能行”为症状表现的“瘴气”也应是高原反应无疑。

《魏书》卷五《高宗纪》:“和平元年六月甲午,诏征西大将军、阳平王新成等督统万、高平诸军出南道,南郡公李惠等督凉州诸军出北道,讨吐谷浑什寅……壬午,行幸河西。八月,西征诸军至西平,什寅走保南山。九月,诸军济河追之,遇瘴气,多有疫疾,乃引军还。”<sup>[18]</sup>吐谷浑本为辽东鲜卑慕容部的一支,南朝时称之为“河南国”<sup>[24]</sup>,与上文《南齐书》所指相同,这里所说的“遇瘴气”指的也是高原反应。

无论是《汉书西域传》中的“大、小头痛之山”,还是《南齐书》中的“河南匈奴地”,其位置均已经远远离开了南岭以南的地域范围。南方暑热而北方严寒,不仅气候条件完全不同,以头痛、呼吸困难为代表的高原症状更是与南越的瘴气相去甚远,但是仍然以“瘴气”来命名。甚至到唐代还专门创作了一个名词“冷瘴”。《通典·边防典六》记载吐蕃地理时云:“暮春之月,山有积雪……地有冷瘴,令人气急,不甚为害。”<sup>[25]</sup>这一说法在《唐会要》《册府元龟》中也多次出现,成为唐代之后史书与医书中正式使用的概念。

“冷瘴”概念的产生首先与“鄯”的“山地”本义有关,虽然在地域上南北悬隔,但是高原地区与五岭地区同样具有地势高峻的特点。因此可以说,南方之“瘴气”与北方之“冷瘴”产生于同样的地理环境之中,也就自然可以把发生于南方的“瘴气”挪移到北方来用,不过在命名上增加一个“冷”字表现出与南方“暑湿”的差异。

“冷瘴”概念产生的第二个原因则来源于对瘴气致病因素中“毒”的认知。《通典·边防典九》“渴槃陀国”条引宋膺《异物志》说“大头痛、小头痛山,皆在渠搜之东,疏勒之西。经之者身热头痛,夏不可行,行则致死。唯冬可行,尚呕吐,山有毒药气之所为也。”<sup>[25]</sup>在古人看来,高原反应的原因是“山有毒药气”,而这一点恰恰与南方瘴气“毒草虫蛇水土之毒”的致病因素相同。《北史》中记载隋炀帝曾于大业五年车驾西巡,将入吐谷浑,樊子盖“以彼多瘴气,献青木香御雾露”<sup>[26]</sup>。陶弘景在《名医别录》中说,青木香“大秦国人以疗毒肿、消恶气有验。今惟

制蛀虫丸用之。常以煮汁沐浴大佳”<sup>[27]</sup>。明代《袖珍方》也说用青木香“不拘多少,煎水服”,可以治疗恶蛇虺伤,并且“效不可述”<sup>[27]</sup>。既然时人认为“冷瘴”是由“毒气”所致,也就无怪乎樊子盖要进献“青木香”以抵御“瘴气”了。

到隋唐之后,渐渐出现了将“瘴气”明确限定于岭南的记载。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中说“此病生于岭南,带山瘴之气。”<sup>[28]</sup>北宋之后,医书中愈发承袭了“瘴气独盛于广南”的说法,但这一说法更多是为了体现出岭南专属性地域医理观念<sup>[29]</sup>,并非意谓着岭南之外瘴气不再发生。

#### 4 结语

“瘴”原作“鄯”,本义是土山,用于描述地理气候的自然状态,并可表示地形上的“隔绝”之义。秦汉王朝在向南岭以南地区开拓领土之时,不仅在五岭遇到了多岭多水的地形阻隔,也遭遇了炎热潮湿的气候条件以及毒草丛生、虫蛇出没的物候环境。这种迥然有别于中原地区的地理、气候与物候构成了“瘴气”的本义,而与之相联系的“暑”“湿”“毒”则成为“瘴气”致病的3种主要因素。“瘴气”渐渐取代“障气”,成为南岭以南地区特定地理气候条件下所出现疾病的名称。到南北朝时期,瘴气的概念扩大,西北边地所特有的高原反应亦被看作“瘴气”之一种,称为“冷瘴”。

#### 参考文献:

- [1] 冯汉镛.瘴气的文献研究[J].中华医史杂志,1981,11(3):44-47.
- [2] 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J].地理学报,1993(4):304-316.
- [3] 左鹏.“瘴气”之名与实商榷[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29-39.
- [4] 何宁.淮南子集释[M]//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98:338.
- [5] 郭璞.尔雅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15.
- [6]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7]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8] 酈道元.水经注疏证[M].张步天,疏证.北京:线装书局,2017:557.
- [9]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3.
- [10] 胡吉宣.玉篇校释卷11[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2272.
- [11] 孙诒让.周礼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12] 范行准.中国病史新义[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9:305.
- [13] 袁宏.后汉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2:141.
- [14] 姚思廉.陈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135.
- [15] 魏徵.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1835.
- [16] 李昉编.太平御览[M].王曉天,钟隆林,校点.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579.
- [17] 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18] 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7.
- [19] 萧繹.汉宋间文献所见古代中国南方的地理环境与地方病及其影响[C]//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历史编类.北京:中华书局,2017:2631-2640.

(下转第1080页)

#### 4 强调扶正护阴,用药平正轻简

汪文绮为新安医学固本培元派代表医家之一,观其治疗疫病的临证经验及其所创治疫方剂,得出其在治疗疫病时针对疫毒热邪伤津耗液的特点,注重强调扶正护阴的思想,且组方遣药遵从方贵专一、药贵用简的原则。其创立的救阴结合解毒治法,创制的乾一老人汤与新制救疫汤中用药也别具特色,多选取性平、甘淡之品。他善于汲取前人经验,擅用豆类与甘草等清热解毒之品配伍治疗疫病热毒之证,如运用扁鹊三豆饮(《世医得效方》《本草纲目》等均有记载),以绿豆、赤小豆、黑豆配伍甘草疏解热毒,很好地发挥了三豆饮清热解毒、益气血、厚肠胃之效;并根据热邪耗气伤阴的程度,酌加玉竹、当归等扶正养阴之属,将养阴扶正寓于消散热毒之中。纵览全方药味少、剂量轻,每剂不过百克左右甚至更轻,其处方平和、用药精简、用量轻巧,但功效专一,以灵验取胜,具有新安医家“平正轻简”的用药风格<sup>[5]</sup>。

#### 5 明辨虚实论治,圆机活法

汪文绮治疗疫病首辨虚实。论实者:疫症初起,疫邪游溢诸经而正气不虚者,可用达原散加减,随经用引以助升泄;疫症见脉洪长而数、大热大渴大汗、本体壮实之人,可给予白虎汤;热邪传里、脉实证实者,宜三承气汤化裁;论虚者:疫病初起发热、素体正气不足者,宜乾一老人汤解毒扶元;疫症初起、邪热不散而伤阴津或失治误治致邪陷三阴者,可以新制救疫汤加减化裁。

汪文绮治疫重视扶正护阴,用药灵动,善于变通,尤忌表散之剂,强调虚者慎用白虎汤、承气汤等寒凉攻下之方,而是先投以救阴解毒之品,若本体素虚而服救阴不效者,为疫毒伤阴、阴损及阳之故,宜用八味化裁救阴补阳;若素体脾虚服救阴不效者,则宜先补脾救土,改用补中益气汤、异功散之类。其辨虚实选方治疫,又善于圆机活法,对于前贤治验“不违乎法而不拘于乎法”。以下摘选医案一则,窥探其疫病学思想与辨治特色。

“小女年十四岁,乾隆癸酉7月26日,下午忽恶寒发热,天明始退。是日余往歙西,四更方回,因未服药,次早诊其脉,弦数而大,头眩呕吐,舌心焦黑,

用何首乌、当归、玉竹、黄泥、甘草、金银花、黑豆之属投之,至夜稍安。28日早又大发热而不恶寒,诊脉仍数大,惟舌焦黑全退,头眩呕吐未止,于前方加参须一钱,服一刻热退其半。29日再进前药,变疟疾五发而痊。<sup>[149]</sup>”

按:此案患者恶寒发热,天明始退,为疫症的典型发热症状。如未得到及时诊治,次日则见头眩呕吐、舌心焦黑、脉弦数而大,因邪热弥漫、耗伤津液所致。汪文绮以新制救疫汤化裁,投以清热养阴之品,阴回则津液内生,当夜则病情稍安。天明后大热又起,但舌心焦黑全退,头眩呕吐症状未解,脉象数大,于前方加参须一钱,取其为须尾性专下达,故对于头眩呕吐之症可顺而下行,又有生津止渴、微有养液之用。此案体现了汪文绮察脉辨证之细致,反映其救阴兼以解疫毒的学术思想和疫病治疗特色。

#### 6 结语

《杂症会心录》记录了汪文绮数十年的临证经验,反映了其主要学术思想和特色,其中对疫病邪陷三阴病机的论述,为完善疫病病机理论做出了贡献。汪文绮以救阴结合解毒之法治疗疫病,创制特色治疫方剂,主要针对体虚之人以及疫病阴液耗伤的症状,以扶正为主、辅以解毒祛邪,意在恢复“正气内存,邪不可干”的状态,这种重视固护人体正气、阴液,同时又兼顾解疫毒的思想,在现代疫病治疗中为体虚之人运用扶正解毒之法,以及疫病后期阴津亏损运用益气养阴之法,提供了新的理论思路和临床治法,具有重要的临床运用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 参考文献:

- [1] 汪蕴谷.杂症会心录[M].董志仁,校.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 [2] 方广.丹溪心法附余[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161.
  - [3] 吴有性.温疫论[M].图娅,点校.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 [4] 叶天士医学全书[M].黄英志,主编.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341.
  - [5] 王键,黄辉,王又闻,等.新安医家处方用药风格[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3,28(11):3295-3300.
- 收稿日期:2020-07-18
- (上接第1068页)
- [20]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2:74.
  - [21] 赵佶.王振国,杨金萍.圣济总录校注[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437.
  - [22] 张介宾.景岳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4:171.
  - [23] 于赓哲.中国古代对高原(山)反应的认识及相关史事研究——以南北朝、隋唐为中心[J].西藏研究,2005(1):1-9.
  - [24] 徐俊.中国古代王朝和政权名号探源[M].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37.
  - [25] 杜佑.通典[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
  - [26] 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3:2594.
  - [27] 刘衡如,刘山永.本草纲目新校注本[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594.
  - [28] 巢元方.诸病源候论[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63.
  - [29] 郑洪.瘴气地域知识观的形成、传播与影响[J].中华文化论坛,2020(5):30-38.
- 收稿日期:2020-09-07